



美好的心愿

[苏]阿尔别尔特·利哈诺夫 著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5

美好的心愿

〔苏〕阿尔别尔特·利哈诺夫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好的心愿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 译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8千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500

统一书号: 10243·32 定价: 0.90元

前 言

《美好的心愿》是一部描述孤儿院和成年人对孩子应负有的责任，以及那些虽有父母，但无父母疼爱的“孤儿”所受痛苦的中篇小说。作者歌颂了主人公、年轻的女教师娜杰日达·格奥尔基耶夫娜舍己为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另一些成年人，他们往往由于不能战胜个人主义，动机与行为脱节，致使对孩子的教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语言朴实无华，尤其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腻入微，读起来扣人心弦，十分感人。

本书作者阿尔别尔特·阿纳托里耶维奇·利哈诺夫是苏联当代优秀的小说家，生于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基洛夫真理报》、《共青团新一代》任编辑。1964年被任命为《共青团真理报》驻西伯利亚特派记者，1966年后到莫斯科，先在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机关，后在《接班人》杂志工作，现任《接班人》杂志主编，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青年创作理事会主席。

阿·利哈诺夫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鲨鱼》、中篇小说《洁净的小石子》、《欺骗》、《音乐》、《木马》、《峻峭的群山》、《日蚀》，长篇小说《迷宫》、《我的将军》等。这些作品主要涉及青年道德形成的各种复杂问题。他的作品不但在苏联多次再版，并且在保加利亚、匈牙利、

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翻译出版，美国、日本、希腊等国也正在筹备出版他的著作。

他的作品曾荣获列宁共青团奖金和俄罗斯联邦克鲁普斯卡娅国家奖金。本书是作者的代表作，发表于1981年。1983年《美好的心愿》被评为最佳作品，荣获社会主义国家青年题材优秀散文作品高尔基国际奖金。

本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中等师范学校对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的辅助材料，对广大中小学教师以及幼教工作者都有很大的启示，也可作为对青年进行理想、道德、情操教育的材料。

本书由杨藻镜、郭大文翻译，由徐铁男校对。

我又失眠了。

通向阳台的门大开着，稠李花浓郁的香气阵阵扑进屋来。也许正是这香气才使得我不能成眠？我想，应该起床下地，把门掩上。可是我连动动手的力气也没有，就象打了麻药似的。头脑非常清醒，身子却重得出奇。别说是手臂，就是手指头，要想动一动也不可能。

我住在二楼。以前——其实就是前不久——我还盼着楼下栽种的稠李快点长起来，长得跟我这阳台一般高。那样，一到春天，满树白花就会开放在窗前，仿佛整个花园踮着脚向我的小屋窥探一样。这一点现在倒是如愿以偿了，而我却犯起愁来。花的香气熏得我昏昏沉沉，不能入睡。

其实，这都是傻话——有稠李花什么事？

透明的窗幔被风吹得时起时落，辛香的气浪一阵阵涌进屋来。

我仿佛沐浴在这香浪之中。

我自嘲地说：尽情地享受吧，你希望的不正是这样吗？现在你如愿以偿了。在尽情的享受中入睡吧。如果你想做神奇的梦，这里条件具备：闻着稠李的花香，你准会梦见童话般的世界。

然而，童话般的世界并没有出现。

我用两肘支撑着俯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六月朦胧的暮

色，望着北国的白夜，尽力分辨着窗外稠李树枝桠的轮廓。黑糊糊的树影在阳台前摇曳着。我知道，这些枝桠上缀满了一串串的白花。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血涌上了两边的太阳穴。明天，不，确切地说，明晚，对于我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

明天，我们班将要举行毕业晚会。

这是我带出的第一个毕业班——这一点尽人皆知。

这是我对自已过失的补偿——这一点，知道的人并不多。

这也是我实现自己誓言的日子——这一点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现在离这个时刻只剩下一个白天和这一个夜晚了。

二

我来到这所寄宿学校已经有十年了。当初我来到这儿差不多是由于偶然的机。当然啦，每个偶然里都包含着必然……

那年八月初，妈妈患了心肌梗塞，我给市教育局拍了一封有医生证明的电报，于是就留下来照料她。

我那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不论是妈妈，还是姐姐奥尔卡、哥哥谢尔盖，谁都不需要我。从我接到分配通知书起，整个春夏两季，由妈妈带头，他们就一直没给过我好脸色。

当然，说妈妈的坏话是不应该的，因此我也不说，何况

十年后的今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好象在这十年中我清醒过来了。好象我曾醉意朦胧，东撞一下，西撞一下，终于一切都变得清楚、现实起来。就连妈妈似乎也变得现实些了，她的看法似乎也行得通了。

可是那时我却什么也不明白——我在医院里日日夜夜守护着妈妈。我的身边总少不了奥尔卡或者谢尔盖，或者谢尔盖的妻子达契雅娜。而且，他们照看妈妈时，总是流露出那样一种神情，好象我压根儿就不在场。我尽力不去理会这些，但这又谈何容易！试想，你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成年人和亲友们却象串通好了一样，异口同声地谴责你，而且是以一种傲慢、轻蔑的态度谴责你，说什么年轻人应当谦恭、顺从，不要发表个人见解；要是别人提供了某种经验，谢天谢地，就应当照人家的去做；要按照大家公认的方式，而不要象你这样开始生活……

这是一场无声的争论，是由妈妈挑起的。

一般说来，妈妈是个好发号施令、强迫别人服从的人。我那时觉得她根本不爱我。在她看来，我的多少个愿望还抵不上她一个随随便便的怪念头。她使我感到压抑，而且这种压抑不是几小时、几天，而是永久的。可是现在，我的想法完全变了。妈妈爱我，而且说不定她对我的爱甚至超过了对奥尔卡和谢尔盖的爱呢！因为我比他俩都小，是妈妈最小的女儿嘛。只不过她的爱带有强制性，是的，原因就在这儿：她的爱带强制性，正如她自己就好强制人一样。

她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态度对待我们。即使在她明明错了的时候，讲起话来也还是那样自信，那样严格要求，从不承认自己有错。

“奥尔卡，隔壁大门里的那个男孩子是不是又送你？你要记住，他配不上你，埃吉克跟你才更般配呢。”

“为什么？”奥尔卡问道，“尼古拉非常可爱，况且你也知道，我俩是同班同学——那时奥尔卡在外语学院学习——，可是埃吉克真让人讨厌！总而言之，干面包一个！”

埃吉克是奥尔卡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那时在综合技术学校学习。他那副尊容真是美到极点了——细高个儿，塌胸脯，简直象是用纸糊的。最主要的，他为人冷漠空虚，死刻板板，就象数学课本上的小节号。一句话，比起那个面色红润、体格健壮的篮球好手尼古拉，埃吉克毫无疑问要甘拜下风。所以奥尔卡两眼睁得圆圆地问妈妈：“为什么？”

妈妈毫不客气：“他不配！”她特别强调后两个字，仿佛给它们打上了足有柱子那样大的重音符号！结果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奥尔卡后来还是嫁给了那个塌胸脯的埃吉克。至于她的生活，我想，恐怕连一丝幸福的影子也见不到。

不过，这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在后面还会提到它。但是，当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用呆滞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病房的天花板的时候，我还没完全理解。

是的，没全理解，但是全都已经感觉到了。否则，我为什么非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不成？为什么要当三兄妹中唯一不听妈妈话的孩子呢？

毕业分配前，我们全班都作了保证，不弄虚作假，不跟家长串通，总之，不搞阴谋诡计，分配去哪儿就去哪儿。

当然，有些人没有履行诺言。有两个极平庸的女生被分到了中学，这两所中学都在我们学习的那座城市，也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她俩一边忸怩地笑着，一边从系办公室走

出来。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名堂，正要涌上去向她们祝贺，这时，她俩倒爽快地承认说，就在昨天，不，应该说就在昨晚，她们出嫁了，嫁给了两个当地人。还有一个男生接到了某专业学校的招聘通知。那个学校侧重英语，而他只学过德语，对英语一窍不通。

其余所有的人都表现得光明正大，甚至对那三个人都不怀一丝恶感，只是有点不大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我那时想得更多的却是另一件事：怎样才能向妈妈、姐姐、哥哥、嫂子隐瞒那三个违背诺言的人的事？我终于成功地瞒过了他们，但还是无济于事。

妈妈又沉默起来。平时，要是有人在哪件事上——哪怕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漠视了她发号施令的权力，她就总是这样沉默不语。我从外面回来，与其说是回家，真不如说进了隔音室——那东西大概是这样称呼吧。妈妈跟奥尔卡聊，跟谢尔盖聊，跟达契雅娜聊，达契雅娜又找奥尔卡，奥尔卡又找谢尔盖，就是没有人来理我。

有时我试图跟妈妈搭讪几句，但她总是声色俱厉地说：

“你得给我留在城里！”

比如，有时我一边开电视机，一边问：“咱们看看这个电影，怎么样？”

妈妈却一字不改地说：“你得给我留在城里！”

“可是我已经接到分配通知了呀！”

“你得给我留在城里！”

“这样做是可耻的！我们全班都下保证了！再说，人家正等着我去报到呢！”

“你得给我留在城里！”

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妈妈总算开了口。否则她会干脆一言不发，而这种一言不发会使你更难忍受。它压迫着你的心、你的灵魂、你的头脑，压迫着后脑勺的某个部位。它使你觉得，最好还是照她的要求做吧，只求别再这样沉默下去了。

过去我一向是这样做的。“是去商店吗？”“该不是跟哪个小伙子去散步吧？”“好啦，我亲爱的妈妈，就按你说的办！”“隔壁那一家有点蛮横无理，是吧？”“可以不跟他们打招呼！”于是，尽管这家邻居没说过我一句坏话，没做过一件有损于我的坏事，我还是照顾妈妈的情绪，顺着她的心意做了。

不知不觉地，我就用妈妈的眼光来看世界，以她的观点来评价人了。就连给电视片子打什么分数，也是按照她的价值标准。老实说，她的标准并不低，但那毕竟不是我自己的。

就这样，直到大学分配前，我从未在任何事情上跟妈妈争吵过，因而也从未受过惩罚。奥尔卡和谢尔盖可就不同了，他们不时受到沉默的惩治，因而后脑勺也不时受到压迫之苦。但是，这种轻松的日子只维持到我认识基里尔的时候。

我的天啊！奥尔卡、谢尔盖、达契雅娜、基里尔——所有这些名字多么动听啊！

基里尔有一次感慨地说：“你真不愧是个语文教师！”也许由于我是语文教师，又总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名字，所以我马上联想起普希金笔下的奥尔卡和达契雅娜，费定笔下的基里尔·依兹维也科夫……可是，天哪！我的亲戚和熟人比起那些主人公来，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乍一看似乎很相象，其实完全不一样……

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看法。而当时，在品评我所见过的人时，我只知拿他们和文学作品作比较。你看，这有多傻！其实，后来这些人既没变坏，也没变好，改变的，只是我对他们的看法。而当时……

就拿基里尔来说吧。

他身材比我矮半头，为此他感到难为情。他在数理系学习，专攻物理，根本就没打算去教中学。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人应当使自己摆脱偏见的束缚。可是谁能想到，为了比一个姑娘稍微矮那么一点点，他就不好意思起来。而且，他是由于偏见才感到不好意思的，这使我很难过。

由于这个原因，每次举行学生晚会，他从不请我跳舞；而我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只好专找姑娘们跳。千万别让基里尔可能由于我和哪个高个男生跳舞而生出醋意来。总之，我们相爱了。后来，在一个迷人的瞬间，我猛然意识到一种极可怕的情况：我接受基里尔的看法，就象接受妈妈的看法一样，既轻易，又情愿！

有一次，基里尔对我大谈起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必然互相冲突的理论来。其实，这种论调早已过时，早已陈腐不堪了。他说，物理学及其成就正在使文学、语言学变得毫无用处。而我这个傻瓜，明明心里知道，我的基里尔在胡说八道，还不时朝他点头称是，随声附和。

这次关于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的谈话——是的，正是这件事，由于这个具体的原因——才使我没走得更远。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事情是明摆着的，争论不过是个空蛋壳——毫无意义。

可是，我那时却不住地向基里尔点头称是，并在大门口

跟他接了吻。回到家，我挨着妈妈坐下来看电视。她对播放的影片不知说了句什么，我便立刻附和了一句。话刚一出口，我便感到，仿佛我的脑袋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天哪！我这是怎么啦？

我成了双重的人，就象天线没调好时电视屏上的图象一样。基里尔说的话，我总满口赞成；妈妈的话，我也从不反对。

我真象大梦初醒一般。记得那时我甚至猛地抱住了自己的头。多可怕呀！我瞟了谢尔盖和达契雅娜一眼，他们互相倚偎着坐在一起。奥尔卡裹着一条围巾。妈妈胖大的身躯穿着一件绗过的绸长袍，挤在她的宝座——一把旧式的软椅里，两条眉毛连在一起，就象有谁在她眼睛上方划了一条黑道似的。

活见鬼！世界怎么会那样虚伪，或者用哲学语言讲，那样虚幻？而我在这个世界里又算什么呢？任人驱使的小卒？别人意见的应声虫？只要妈妈说句话，我就表示赞成；基里尔一开口，我又表示同意。要是再有什么人说点什么，我也该相信他吗？原来我总是想，千万别惹妈妈不高兴，可是不知不觉地，我变成什么了？一只变形虫？谁都知道，变形虫可以碎成好几段，每一段都能独立地成活。可是我呢？要是有一天妈妈和基里尔的意见不一致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我仿佛在撕扯一层包围着我的薄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正在从身上去掉某种东西。

我的这一发现是在冥思苦想中得到的，没有经过矛盾冲突。谢天谢地，我还没落到进退维谷的地步。我的这个变

化妈妈并没察觉。我照旧附和着她，然而这时我的附和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还没等我的话表达出什么意思，这些话本身就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了。我的话只不过是一些单词的读音，而且这些单词其实也不是我想说的。当我随声附和表示赞成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真同意这一观点。

与此同时，我的独立见解却意外地形成了，而且恰恰是在临近毕业分配时形成的。有个从农村来的男生挖苦地说：我们乡下佬当然得向后转，回区里去，城里没人希罕我们。而你们城里人呢，就会死乞白赖地守着柏油马路不肯离开。至于姑娘们，就更甭提了，她们自有一套老办法：不管爱不爱，匆匆忙忙找个城里人嫁出去了事，连你们的亲友都没法为你们高兴。难怪城里有那么多用非所学的中学教师呢。

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我的胸膛，我喊道：“咱们起誓吧！保证诚实，就象十九世纪那样！”

全班顿时沸腾起来。班长米罗诺夫从前到过我家，这时他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娜杰日达，你妈妈最不肯放走的就是你啊！”

我吓得一愣，脱口喊道：“这关她什么事！”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月的沉默，打破这沉默的，只有那声嘶力竭的一句话：“你得给我留在城里！”接着就是急救车，医生的忙乱，病房，妈妈那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的目光，以及那种病房里压根儿就没有我似的感觉。其实，除了小睡一会儿之外，我一直没离开过这里。

再往后便出现了妈妈的宽恕。确切地说，是半宽恕、半同意、半犹疑。

我们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尽管有

我在身边，奥尔卡还是请了假照顾妈妈。等屋里只剩下妈妈和我的时候，她问道：“怎么，还是要走？”

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所以她这句话听起来简直就跟大炮在耳边轰鸣一般，我甚至哆嗦了一下。但是，在妈妈患心肌梗塞以前的那个月，以及她住院的那个月，我心中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谢天谢地，我毕竟还是个活人。

我鼓足勇气，没有避开目光，而是象一个好女儿应该做的那样，两眼看着妈妈，肯定地说：“是的。”

她叹了口气，眼睛里闪过一种近乎怜悯的神情。她郑重地伸过一只手，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便走近她，低下了头。她吻了吻我的头顶，却没有吻我的脸颊和双唇——她对我还没宽恕到那样的程度。我给她掖好了被子，走出病房，来到过道里。我稍稍修饰了一下被泪水弄湿的睫毛，就到邮局给我该去的那个市教育局发了一封电报，说明近期内将启程赴任。

我被分配到一个北方的城市——分配到了城市，那有什么办法，反正我问心无愧。这个城市并不算小，有二十万人口，语文教师也不缺。因此，当我于九月下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分配给了别人。我只好按局里的建议，到一所寄宿学校补一名教养员的空缺。

学校把我安置到一家私人住宅里，不，确切地说，是私人住宅的一个用花布帘子隔开的角落里。我打开手提箱，拿出妈妈的像片——它镶在一个古老而奇巧的镜框里，把它摆到桌上，然后就大哭起来：寄宿学校的教养员，根本就不算教师，而且我原来也没打算干这个呀！

看来妈妈是对的，家里比这儿更需要我，至少妈妈更需要我。

然而，已经无路可退了。

三

要是妈妈对我稍微减轻点压力，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跑回家去了。不知是由于经常阴天，屋顶上面总是乌云密布，还是由于各主要街道的房屋都是用水泥砖砌成的缘故，这座北方的城市近看起来显得灰蒙蒙的。并且，我住的那个以花布为墙的角落也显得很牢靠、不稳当，穿堂风一过，就觉得晃悠悠的。我住的这幢房子是木头房，里面住的人已经满得不能再满了，是个名副其实的臭虫窝。每天我都看见一些陌生的人在各个小门里进进出出。公共厕所位于长长的过道的尽头。那位给我栖身之地的大婶列别斯金妮雅——这可真是怪名字！——只顾操着北方的口音在一旁闲聊，对我的痛苦袖手旁观。

那些日子，连我作的梦也都是平平淡淡的。我梦见了家里那所天花板上饰有泥塑花边的古老房子，梦见了我那摆着几个书架的温暖的房间，漂亮的中国花瓶插满了鲜花，绿罩台灯发出柔和的光。我的天哪，甚至还梦见了四壁镶着带花边的浅蓝色瓷砖的卫生间！

也许在旁人看来，我那时就象一只掉进水坑、浑身湿淋淋的可怜的小狗，虽然一声不吭，可是哭丧着脸儿，一幅惘然若失的狼狽相。

这些话并不是我自己要讲的，而是我用别人的眼光、别

人的口气来讲的。因为，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哪怕她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是一只浑身湿透、两腿直立、眯着一只眼睛神气活现地看着她的小狗，她也未必会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

在所有人当中，校长阿波罗·阿波利纳里耶维奇——借他名字的光！——可算是最重要、最特殊的人了。不久，也就是仅仅过了几天，我便得知，他有一个颇为可爱的绰号——“阿波罗沙^①”。不但学生这样叫，教师们也这样叫。我听后禁不住笑了起来。因为这个绰号不但没有恶意，而且非常符合他的外貌：圆圆的秃头象是用圆规划的一样，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身子，连手掌也是圆滚滚、胖乎乎的，好象一对蓬松的小枕头。总之，阿波罗沙从头到脚都是福福泰泰，胖胖乎乎的。

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在门口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愉快而和善地笑着，越发显得圆滚滚的了。他象个皮球似地跳到我面前，用两只小枕头般的胖手拉着我问：“您是娜杰日达·格奥尔基耶夫娜吗？嗯，嗯……是哪个格奥尔基的后代？常胜者格奥尔基吗？”我慌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继续握着我的手，不等我回答，就又大声地说：“太好啦！‘常胜的娜杰日达’！您自己听听吧，这名字多好啊！^②‘常胜的柳鲍芙’？不会落空！‘常胜的薇拉’？很有可能！^③但是‘娜杰日达’，加上‘常胜的’，这是多么不同凡响啊！您是语文教师，一定能听得出我的意思的。您

①意为“美丽的太阳神”。——译者

②“娜杰日达”原意为“希望”。校长在这里用的是双关语，既表示女教师的名字，又表示对她所寄予的希望。——译者

③“柳鲍芙”，“薇拉”是俄罗斯女人名，原意分别为“爱情”、“信心”，在这里也是双关语。——译者。